

4611
96

在波茨坦的会晤

小查尔斯·米著



在波茨坦的会晤

〔美〕小查尔斯·米著

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Charles L. Mee, Jr.
MEETING AT POTSDAM
M. Evans & Company, New York, 1975.
根据纽约埃文斯出版公司1975年版译出

在波茨坦的会晤

〔美〕小查尔斯·米 著

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5印张 202,000字
1978年5月第1版 197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1002·493 定价 1.00 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美国、英国和苏联三国首脑在德国柏林近郊波茨坦举行会议，讨论处置德国、战后欧洲的安排、苏联对日参战等问题。这个会议产生了两个主要文件，一个是会议结束后发表的《波茨坦协定》（见本书附录，又称《会议公报》，内容有十四项），另一个是当时没有发表的三国《议定书》（内容有二十一项，包括《公报》中的十四项）。此外，在会议过程中还发表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见本书附录）。波茨坦会议对于战后欧洲的形势以及苏美关系的格局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美国人小查尔斯·米所著《在波茨坦的会晤》一书，记述了波茨坦会议的前后经过，并对这次会议的性质和后果提出了作者个人的见解。作者认为，在这次会议上以美英为一方同以苏联为一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会议开幕前一天，美国试验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想以此增加同苏联讨价还价的资本。可是，据作者记述，斯大林对美国的这一新式武器毫无所动。美国的原子弹并没有能影响会议中的力量对比。由于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取得的辉煌胜利和当时的整个国际形势，美英已无法排除苏联在欧洲的影响。经过十多天激烈的争论，三国就战后的

世界安排，特别是欧洲问题取得了一些协议，如：占领德国的基本原则，德国赔偿，波兰西部疆界，对意大利的政策，哥尼斯堡地区割给苏联，等等。作者认为，所有这些协议都是美苏两家之间达成的妥协，而英国在会上实际上已失去了发言权。作者还认为波茨坦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划分势力范围的会议，通过会议，美苏在欧洲划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且造成了德国的分裂。

作者在写作本书时引用了当时的会议记录、美英两国有关的档案，还从参加波茨坦会议的英美代表团成员中了解到不少情况，因而本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作者的某些观点是反动的。他对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肆意污蔑，并对斯大林本人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对于书中的这些反动观点，请读者注意分析批判。

1977年2月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杜鲁门	5
第二章 邱吉尔	28
第三章 斯大林	52
第四章 七月十六日,星期一	74
第五章 七月十七日,星期二	90
第六章 七月十八日,星期三,午餐	112
第七章 七月十八日,星期三,下午三时零四分	117
第八章 七月十八日,星期三,晚餐	119
第九章 外交部长	124
第十章 国家首脑	139
第十一章 力量的估计	156
第十二章 讨厌的人	171
第十三章 分裂德国	188
第十四章 幻想和梦魇	200
第十五章 两巨头	213
第十六章 邱吉尔回国	229
第十七章 “莫库萨次”	240
第十八章 艾德礼和贝文	253

第十九章 交易	259
第二十章 八月一日, 闭幕时刻	274
第二十一章 “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289
第二十二章 后记	295
 附录一 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317
附录二 波茨坦协定	319

序 言

为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重建世界，哈里·杜鲁门、温斯顿·邱吉尔、约瑟夫·斯大林于1945年夏季7月17日至8月2日进行了两周聚会。正如杜鲁门总统所说，他们是“在离受到战争破坏的纳粹政权中心地只有几英里的地方”，即柏林郊区波茨坦的西席林霍夫宫，围坐在一张铺有台面呢的圆桌四周举行会议的。这里大胆叮人的蚊子和闷热的天气给他们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战争结束后，三巨头暴露出他们固有的不同利益，本来就抵触的雄图大略，以及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信仰。大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候自然——甚而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同的利益，这是由它们各自的历史状况、经济需要、军事力量、政治理想和不安心理所形成的。外交工作的任务是缓和抑或加深这些分歧，则取决于其目的是合作还是对抗。

在战争期间，三巨头举行过两次重要会议：一次是1943年11月在德黑兰，一次是1945年2月在雅尔塔。这两次会议通常被认为是成功的：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在大事讨价还价后互相作了真诚的让步，他们保住了他们的军事同盟，以便把反对德国的战争进行到底。事后人们一直批评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对斯大林过于慷

慨，但就雅尔塔会议的主要目的来说，它还是成功的。而且，盟国在战时几次会议期间有所发展的融洽关系似乎可持续到战后，因而能对世界和平产生良好影响。雅尔塔会议结束时，《时代》杂志报道说：“关于三巨头能否不仅在战时而且在和平时期进行合作的种种疑虑，似乎都被一扫而空了。”

不过，在波茨坦，人们的疑虑又强烈地出现了。争论的问题多半和前几次会议一样——如何对待德国、在东欧所要达到的目标上的冲突、领土要求方面的争端——但外交手腕大多不一样。在这最后一次三巨头会议的进程中，冲突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外交上常见的灵活性消失了；言词激烈起来；态度顽固和盛气凌人已成为国策了。

由于盟国间的融洽关系已在波茨坦结束，由于这次会议没有确保一代人的和平，所以它一般被认为是一次“失败的会议”，也因此而被认为是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一个小插曲。我们大多数人总以为，战胜国的领导人在战争结束时聚首一堂是为了确保未来的和平。因此，我们大多数人无法想象，我们的战后政治设计师何以留给我们的竟是在分裂的德国问题上和在东欧问题上的斗争，扩大全球大部分地区的俄美冲突，核武器竞赛中的恐怖和威胁，以及偶尔发生但伤亡不小的“小规模”战争。不知为什么，看来波茨坦会议是失败了。

为了解释三巨头如何这样准确无误地把世界引入新的敌对状态，一些历史学家指出了俄国人在世界范围内

的咄咄逼人；左翼修正主义者推测了美国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帝国主义侵略性；经济学家觉察到了在贸易和原料上必不可免的竞争；军事战略家著文谈到了西欧遭到破坏而出现的权力真空以及强国要去填补真空的必然趋势；其他人则认为是美国人性格的幼稚，无法对付旧世界肮脏的强权政治，而希望通过把美国地方性的民主自由主义形象投射到全球来找到安全。

上述种种解释没有一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每种解释都有这么一个缺陷，那就是以为这些人是谋求和平的，不料却被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所压倒。所谓善良愿望由于不可抗拒的力量的阻挠而未能实现，是一种安抚人的观点，可惜，波茨坦会议的情节并不能证明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与此相反，这次会议显示出三巨头都一心要扩大他们国家和他们本人的权力，他们都认为倾轧的世界比起平静的世界更能增强他们的力量。于是，在正式会议的速记本上，在非正式谈话的笔记本上，在关于宴会的回忆中，在开玩笑和大笑声中，在关于邱吉尔的美梦和恶梦的报道中，在哈里·杜鲁门的随便谈话中，在斯大林的冷酷伪装中，我们看到这三人把历史上形成的力量、固有的国际冲突、不同的政治和经济需要等因素，揉合成可以作为宣战理由的某种东西。会议结束时，他们没有象报界所预料的那样拟订出和平协议，而是签署了一个无异于进行冷战的三国宣战书。本书所记也就是他们如何在和平逼近之际竭力把纷争保持下去的情况。

第一章 杜鲁门

“我准备好去会见斯大林和邱吉尔，”杜鲁门总统7月3日给他母亲写信说，“准备出访是件烦杂的事情，我得带上小礼服、燕尾服……礼帽、大礼帽、小礼帽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用品。我的公事皮包装得鼓鼓囊囊，里面尽是关于以前历次会议的参考材料以及关于我这次要讲些什么、做些什么的建议。我真不想去，但还是得去，如今已是欲罢不能了。”

7月7日早晨六时，杜鲁门快步走下专车，来到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城六号码头，在管乐声中登上“奥古斯塔号”巡洋舰。总统被顾问、好友和特工人员组成的随从团团围住。他们先进入餐厅用早餐。随后，总统戴一顶便帽，系一个圆点花纹蝴蝶结领结，穿一双黄白两色夏天皮鞋，在随行人员偕同下登上舰桥。六时五十五分，总统命令“奥古斯塔号”启航，于是这艘军舰在天空晴朗、海面平静、暖和的七十九度的微风吹拂下，以二十三海里的时速启程开往安特卫普。

马基雅维里^①写道：“欲了解某一个统治者和他的智力，但看他身边的人，即可略知一二。大凡他的左右手既

^① 马基雅维里(1469—1527年)，意大利思想家和历史学家。——译者

得心应手，又忠诚不贰者，则可称此统治者英明，因他能识才，复能得他们的忠诚。若不如此，则人皆非之，因他于用人一事即首先犯了错误。”在舰桥上，杜鲁门的新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和他的军事顾问威廉·李海海军上将距离杜鲁门最近。

据《时代》杂志说，人们把吉米·贝尔纳斯视为“政客们的政客”。约瑟夫·艾尔索普和罗伯特·金特纳说他是“一位身材瘦小、结实而匀称的人，脸长得有点怪，棱角鲜明，目光炯炯、带有一股爱挖苦而又和蔼的神情。”敌人说他狡诈，朋友称他“能干”。他生于1879年，童年在南卡罗来纳州老查尔斯顿城“金街的一所阳台下陷的小木板房”中度过。就是在这种贫困的环境中，他发迹起来。1910年，他进入国会。他说：“我参加竞选时一无所有，我的资本是脸皮厚，靠了它才以五十七票的多数当选。”他在国会中打响的第一炮是强行组成众议院公路委员会——本世纪最大的摇钱树之一。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担任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委员，这是被严格挑选出来执掌国家财政大权的绝无仅有的几个人中的一个。1930年，他被选入参议院。《时代》杂志指出，罗斯福“向参议院提出重要提案时，凡是贝尔纳斯参议员支持的，从未被否决过；而贝尔纳斯参议员反对的几乎从未获得通过”。正如艾尔索普和金特纳所说，“要知道他有多大本事，只需亲眼看看他怎样使麦克纳里答应不提反对意见，怎样博得傲慢的众议院领袖们的好感，怎样诡计多端地等待他在参议院的发言机会，以使一项重大的国防〔开支〕计

划立即得到通过。”

迪安·艾奇逊说，“贝尔纳斯先生精力充沛、性格外向，习惯于象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政界那样活泼地交换意见”，“他不神经过敏或缺乏信心”。除了这种不神经过敏的过份自信外，他对外国的情况十分无知。因此，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嘲笑他缺少修养。这些官员们完全忘了，贝尔纳斯在疏通官方、替人说项、奔走调停党派争端的事儿上神通广大得很呢。

1944年夏天以前，贝尔纳斯和杜鲁门的交情一向还算不错。那年夏天，传闻四起，说什么在即将举行的争取连任的竞选运动中，罗斯福可能抛弃副总统华莱士，但是罗斯福对这股风却听之任之，不置可否。贝尔纳斯出来活动争取当副总统候选人。在芝加哥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之前不久，他打电话给杜鲁门，要求后者提名他当副总统候选人。杜鲁门表示同意——后来又一口咬定，对于当时他的友人正竭力要求罗斯福赞成杜鲁门本人当副总统候选人一事，他毫无所知。贝尔纳斯来到芝加哥时颇有把握，满以为提名已是非他莫属了。杜鲁门到达后，被请去同罗伯特·汉尼根会晤（汉尼根是来自杜鲁门家乡密苏里州的一名竞选经理人，在杜鲁门支持下，当时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同汉尼根一起在座的有邮政总局局长、汉尼根的前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守口如瓶”的弗兰克·沃克以及三位党的“大头子”——泽西城的黑格，芝加哥的凯利和布朗克司的弗林。据传说，会见结束时，汉尼根打电话找到罗斯福总统，要他说服不情愿

的杜鲁门接受提名。据说，罗斯福对党的头子们说——言下之意也是对代表大会，对吉米·贝尔纳斯以及对历史说，“告诉他，如果他要在战争期间分裂民主党，他要负责。”

贝尔纳斯愣住了，他又羞又恼，一气之下离开了芝加哥。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逝世时，杜鲁门把贝尔纳斯召到华盛顿，委以国务卿一职。新总统以为，这样抬举，多少会消除前隙于万一。也许，贝尔纳斯并不是这样看这一问题的。有些人认为，他觉得人家从他手中骗走了总统的位子。艾奇逊说，贝尔纳斯以“参议院议长对待新来的参议员的态度”对待杜鲁门——或者说，杜鲁门认为贝尔纳斯这样对待他。但是，贝尔纳斯自己坚持说，他对“杜鲁门先生毫无恶意，我充分理解杜鲁门的处境”。不管贝尔纳斯和杜鲁门彼此之间感情怎样，他们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对派系斗争的作用的理解是差不多的。

海军上将威廉·李海1875年生于衣阿华州，1897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军官学校。说也奇怪，他的经历听起来倒象一位英帝国海军上将。菲律宾暴动时期，他首次服役，参加西美战争。1912年占领尼加拉瓜和1916年海地战役中，他任参谋长。1916年，赴墨西哥讨伐反叛作乱者，他指挥了美国军舰“海豚号”。1939年，他自海军退役，罗斯福总统任命他为波多黎各军事长官。

他个子高大，挺直，秃顶，浓眉，执行纪律绝不通融，但军务之暇，为人却很随和。他的回忆录题名为《现场目击记》，倒也名实相符，因为不论参加会议、招待会、宴会

以及在地图室、飞机和舰船上，或是在正式的新闻图片中，他总站在罗斯福总统和杜鲁门总统的身后。尽管不论在哪里都有他，然而对于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李海倒不是全然都看在眼里的。关于贝尔纳斯的消息，白宫上下数他最后一个知道。有一回，罗斯福提到，杜鲁门将充当他的副总统竞选伙伴，这位海军上将问道，“哈里·杜鲁门到底是谁啊？”那次是在民主党代表大会期间，李海象往常一样，坐在罗斯福身旁——正乘坐总统专车旅行。

如果说出了什么新闻，李海不总是最先知道，那么，他却是最不会忘记这种新闻的人。在战争年代，他自始至终起了军事情报交换所的作用。虽然李海有时好象会插科打诨，他掌握的世情却很可靠，很有用。他偏爱直截了当的军事解决办法，因为这能够逆料，杜鲁门要作出评价也不难。这位海军上将还具有从政者所最最珍视的一种品质，那就是李海对他的总司令忠心耿耿，十分可靠。旁人由于比较世故，比较大胆或仅仅华而不实，因而调动频繁，李海从来不离杜鲁门左右。

在舰桥上不远处站着总统的密友、调皮捣蛋的哈里·沃恩准将。他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体重二百十六磅，粗野，爱拍肩、打扑克和恶作剧。沃恩从来摆脱不掉密苏里州式的权术。他在白宫大搞那介绍政府合同、收取少量回扣、到头来幼稚得可爱的贪图小利的风气。虽然，做几十亿美元生意的合同到处都有，沃恩偏偏看中香水制造商。只要报上揭露什么小小的令人难堪的名堂，“找沃恩去”的说法就会在白宫不胫而走。

眼下，沃恩忙着两桩交易。5月1日，他用白宫的信笺，为香水制造商、艾伯特·维莱公司老板戴维·贝内特开介绍信，说贝内特先生“应得到美国驻外官员的协助”。贝内特先生因此不费分文，乘坐空运勤务部的飞机，从国外带回香水精四十一公斤。

贝内特的一位朋友的朋友为前途计，觉得可以为自己的水果冷冻机生意抬高点声誉。6月里，他给哈里·沃恩和密苏里州独立城杜鲁门夫人各送去了一台价值三百九十美元的冷冻机。沃恩和总统伫立在“奥古斯塔号”舰桥上时，冷冻机也正在送往总统助理詹姆斯·瓦达曼和马修·康内利处的途中。几天后，“奥古斯塔号”到达航程终点，头顶上，空运勤务部的飞机将再载送艾伯特·维莱公司的一些人员去欧洲，为这家香水厂作一笔“橘子精”买卖。

杜鲁门和沃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起在军队中服役时结识。1940年，当时的上校沃恩参加了杜鲁门争取连任参议员的竞选活动。一位竞选班子负责人说：“我们要找一个人掌管财务，一个有名气或有头衔的人”，“我们找到哈里·沃恩，他有上校衔，当时在伊利诺斯州销售活叶簿用品。”从此以后，沃恩和杜鲁门成了形影不离的莫逆之交。上午，沃恩头一个见到总统并出席每天的工作人员会议，中午常和总统共进午餐，下午跟总统一起游泳，作为宫廷弄臣，他使总统笑口常开。在人们情绪低落时，沃恩就会拿出纸牌来打扑克，讲些往事，以娱内廷这帮核心权势人物；比如，说什么他在堪萨斯市把一头牛放到巴尔